

红色电波映初心

□刘津

2026年,是毛泽东、朱德代表红一方面军签署调学生学无线电令95周年。回望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的艰辛创建历程,这段厚重的红色历史震撼人心。战火中浴血向阳的坚毅身影,困境中执着求索的铿锵足音,苦难中勇于创新的坚韧品格,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熔铸的红色基因与革命精神,历经岁月洗礼依然跨越时空,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。

红色无线电事业发端于革命烽火。红军无线电事业的诞生,源于革命战争的迫切需求。20世纪30年代初,苏维埃运动在赣鄱大地如火如荼地开展,红军面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“围剿”,战场态势瞬息万变。在没有电台之前的红军队伍,依靠传统通信方式联络,如同号、旗语、徒步送信等,传递速度慢、覆盖范围窄,且极易被敌军截获或阻断,严重制约红军的作战指挥与部队协同,给革命事业带来极大阻碍。1930年12月,在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龙冈战斗中,红军缴获敌军一部电台,可惜由于发报机的损坏,仅余收报机能够使用,这便是载入史册的“半部电台”。不久,红军在东部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,至此,红军一共拥有了“一部半电台”,为红军无线电事业埋下了第一颗种子。1931年1月6日,宁都小布的龚氏家中,留用并自愿参加红军的技术人员怀着对革命的热忱,克服设备简陋、环境恶劣等困难,成功架起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电台。当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清晰传出时,这部电台被毛泽东誉为“没有纸的报纸”,其对革命的重要价值迅速显现,引起红军领导层高度重视。1931年1月28日,毛泽东、朱德亲自发布命令,要求大力发展无线电事业,重点培养红军自己的专业人才,实现“使我们中央与其他各特区,一、三军团与红军其他各军团的通讯灵便”的目标。在缺器材、缺人才、缺教材的极端困境下,红军凭借敢于拼搏、白手起家的精神,以“一部半电台”为起点,靠战场缴获补充设备、留用技术人员传授技能、就地取材自制器械,从零构建起红军无线电通信体系。

红色无线电发展于开拓创新。以“一部半电台”为起点,红军在宁都小布架起的电台主要承担两项关键任务:一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新闻电讯,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;二是侦听敌军电台信号,搜集兵力部署、作战计划等核心情报,开创了红军技术侦察工作的先河。当时,红军在小布陈家土楼成立了第一支无线电队,标志着无线电通信事业进入有组织、有计划的发展阶段。红军既无专业技术人员,也无操作经验,创建事业如同在荒草中开路。为解人才之急,1931年2月,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陈家土楼开班,后续又在多地累计举办11期,培养出200多名优秀通信人才,为事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。在第二、三次反“围剿”斗争中,无线电队精准截获敌军密码通话与密电指令,为红军掌握敌军动向、制定歼敌策略提供核心情报,助力红军实现“以弱胜强、以少胜多”的战场奇迹,创下“横扫千军如卷席”的辉煌战绩,生动书写了“科技是核心战斗力”这一理念的早期内涵。借助无线电技术赋能,红军突破传统军事思维桎梏,创造性地将无线电技术与游击战、运动战相结合,构建起覆盖中央苏区的通信网络,开创了人民军队信



位于宁都县小布镇小布村的无线电初心教育基地。 记者肖靓 通讯员李丹 摄

息化建设的全新道路。这条从无到有、从弱到强的奋进之路,树立了“自力更生、开拓创新”的典范,为后继人民军队通信事业乃至国防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。

红色无线电成长于实战实训。红军无线电事业的创建历程,是一部攻坚克难、无私奉献的奋斗史。为了战斗的胜利,无线电战士背负着沉重的电台设备随军前行。他们以胜利为目标,以电波为武器,既要迎着枪林弹雨、紧逼前线,又要调试破译、收发指令,以向死而生的革命精神坚守岗位、捕捉每一份有用的信息。他们以实战促提升、以意志胜苦难,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困境中创造奇迹:电池缺乏就手摇发电,即便手臂酸痛仍保持电力不断;零件缺少就拆废凑新,即便再难仍要保持电台运转;敌军封锁就英勇穿越,即便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仍要保持通信畅通。他们凭借忠诚与智慧,守护好这一无形的红色电波“生命线”。正是这支在战火中组建、在实战中成长的红色队伍,带着简陋电台转战各地,开局即进入实战。他们一边克服器材短缺、环境恶劣的阻碍,一边在战斗中高效完成情报侦听、指令传输任务,以实战实训促能力提升。在“边学边用、以战促训”的磨砺中,他们被锻造成为一支“召之即来、来之能战”的通信尖兵,形成了“不怕吃苦、严谨细致、团结协作”的优良作风。

95年岁月流转,红军无线电创建历程已沉淀为底色鲜红的历史记忆,见证了红军在艰苦卓绝中求生存、谋发展、求胜利的顽强意志。从“半部电台”开始到现代化通信体系,从战时应急联络到新时代信息化保障,红军无线电事业的初心使命始终未变,红色电波的精神在代代传承中生生不息。

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中央苏区和各地方苏区深陷敌人层层封锁中,无线电通信成为苏区与党中央、各苏区之间互联互通的“生命通道”,更是打破敌人信息隔绝、凝聚革命力量的关键纽带。危急关头,红军通信战士始终以赤胆忠诚守护电波畅通,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党绝对忠诚,让红色电波成为永不消逝的信仰信号。



收藏在宁都中央苏区反“围剿”战争纪念馆的“半部电台”。 记者肖靓 通讯员李丹 摄

攻坚克难的奋斗意志。红军无线电事业起步之初,面对器材极度匮乏、技术基础薄弱、生存环境恶劣、物资短缺的一穷二白局面,通信战士们没有退缩,迎难而上,发扬“有条件要上,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的顽强奋斗精神。他们就地取材、自力更生,用陶瓷碗制作电容,用铜线缠绕铁钉做成电感器,用手摇发电机替代电池,在极端困境中突破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。正是这份不屈不挠的奋斗,让苏区与外界有了电波联络,为粉碎敌人“围剿”、巩固苏区红色政权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。

严守纪律的优良作风。苏区时期,红军就为无线电通信工作制定了近乎严苛的纪律要求,成为刻在每个通信战士心中的行动准则。哪怕遭遇极端危险、身陷绝境,通信战士的首要任务永远是销毁密码本、破坏电台设备,以生命守护机密,绝不让通信设备和核心机密落入敌人手中。“宁死不露一字”的坚定坚守,让红色电波成为敌人始终无法穿越的“保密屏障”,这种严守纪律的优良作风,也成为红军无线电事业薪火相传、生生不息的精神根基。

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。为了革命事业,无数无线电通信人员主动告别亲人、奔赴最危险的前线阵地,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;以王诤等为代表的早期红军无线电骨干,更是主动扛起重任,全身心投入红军电台建设和通信人才培养,为红军部队和各苏区输送了一大批懂技术、敢担当、忠信仰的通信人才。

一条特殊的红军标语

□汪行舟

在中央苏区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中,红军部队始终将宣传工作视为联系广大群众、传播革命火种的重要手段。为了深入宣传党的政治理念、不断扩大红色政权的影响力、争取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与支持,红军每进入一个新的区域,都会系统性地策划并实施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。这些宣传手段极具多样性与创造性:既包括散发传单、刷写标语、张贴口号、绘制壁画等直观形式,也涵盖编辑报刊、组织演唱队、排演活报剧等文化传播方式,构成了一整套多层次、立体化的宣传动员体系。

在崇义县思顺乡思顺村,有一座被称为朱氏居民楼的古朴建筑,在这座历经沧桑的老宅中,保存着一组极其珍贵的红军标语。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,更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印记。其中,“纪念李卢不死精神”(即列宁、李卜克内西、卢森堡)一句尤为特别和罕见,该标语不仅承载着文字表面的意义,更蕴藏着特殊的历史语境与深沉的情感寄托,折射出红军在艰难岁月中的坚定信仰与理想追求。

1932年1月10日,中革军委发布《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》,明确提出中央红军必须坚决攻克赣州,并以赣州为枢纽向北推进,力图实现革命在江西省的率先胜利。由于赣州城墙坚固,易守难攻,红军虽英勇冲杀,数度强攻仍不下,伤亡较大,最终停止攻击。这场重大的军事挫折,不仅造成人员与物资上的损失,更对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心理造成沉重打击,一时间,部队士气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迷状态。1932年3月下旬召开的江口会议,仍作出了坚持“以赣江流域为中心,向北发展”的战略决策,并将部队重新整编为“中路军”与“西路军”,指令彭德怀、滕代远率领西路军向于都、崇义、遂川等地进发。这一明显脱离实际的部署,使官兵情绪进一步跌落谷底,许多战士对上级的决策感到困惑与失望。

尽管内心充满不解,彭德怀与滕代远仍以大局为重,坚决执行命令,克服困意向西挺进,他们率领红三军团部分部队于当年5月抵达崇义县思顺乡。

此时部队长途跋涉、人马困乏,急需休整。于是红军决定在此驻扎进行短期休整与驻防。正是这段休整期为战士们提供了宝贵的喘息机会,也为后续军事行动积极筹措人力与物资,重新积蓄革命力量。

红军进驻思顺乡之后,迅速开展扎实的群众工作:打土豪、分田地,切实帮助贫苦农民改善生活;积极团结小商人、手工业者,动员他们恢复生产、支援革命。其中,一支红军排被安排驻守在朱氏居民楼,他们不仅负责当地的群众动员与宣传,还参与了指挥所的筹建与临时医院的设置,同时为西路军的整体行动提供侧翼掩护与后勤支持。

在这一过程中,宣传工作始终被置于重要位置。那些略通文墨的红军战士,常常随身携带简陋的笔墨工具,坚持每日至少书写三条标语,以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向群众宣传革命主张。“没收地主土地等十项主张”“欢迎民众回家平分田地”“打倒帝国主义”“当兵就要当红军”等口号,既朗朗上口又具有极强号召力,成为连接红军与人民的桥梁。

正是在这种浓厚的革命氛围与紧迫的历史环境下,红军战士于朱氏居民楼东侧墙面,以朴拙而有力的笔触,写下“打倒帝国主义!”“消灭匪祸!”等标语。

一天,连队指导员拿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《红旗》,组织战士集体学习。他朗读了1930年1月18日刊登的一篇题为《纪念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》的文章,其中写道:“1月21日是世界革命领袖列宁逝世六周年纪念日,我们现在纪念他,不仅因为他有领导革命的伟大功绩,更因为他为我们指明了革命的必由之路。我们不仅要表达敬意,更要学习他的主义、实践他的主义……”

话音未落,一位负伤的宣传战士激动地站起身,手持毛笔、蘸取自制红墨,迅速攀上楼梯,在原有标语之间奋笔写下“纪念李卢不死精神”九个鲜红大字。随后,席地而坐的战士们纷纷起立,紧握右拳,齐声高呼这句口号。

这句标语,不只是一句口号,更是一段历史的注脚、一种精神的象征,它不仅显示出红军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援与信念,更深刻反映出他们在遭遇重大挫折后仍坚定理想信念、不畏牺牲、继续抗争的革命精神。

爷爷的军旅生涯

□钟瑞华

在我的行李箱底层,珍藏着一件用红布精心包裹着的传家宝——爷爷的革命伤残军人证。那是父亲临终前郑重托付给我保管的,它不仅仅是爷爷光荣历史的见证,更是爷爷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我的爷爷钟立友,是兴国人,是一名在长征途中负伤的红军士兵。1931年,还未满17岁的爷爷怀着对革命的赤诚,积极响应党的号召,成了一名红军战士。在4年多的革命生涯中,爷爷历经中央苏区第二次至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斗争,参加了广昌保卫战、湘江战役、土城战役、鲁班场战斗等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。

1935年3月,贵州仁怀鲁班场战斗成为爷爷革命生涯的转折点。当时,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司令部参谋的爷爷被火线任命为代理连长。面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,他毫无畏惧,带领战士们发起数次猛烈冲锋,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。激战,一颗子弹射向爷爷的胸膛,差点击中心脏;另一颗子弹穿透了爷爷的右脚踝骨……鲜血染红了军装,但爷爷依然坚持指挥,直到因失血过多而昏迷倒下。后来爷爷回忆说,当时他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:宁可前进一步死,决不退半步生。

负伤后的爷爷奄奄一息,幸得当地老乡的悉心救护和冒险保护,才免遭国民党军的毒手。在老家乡储存白酒的地窖里,爷爷度过了生命中最漫长的3个月。每天听着地面上敌人的搜查声,忍受着伤口的剧痛,还始终惦记着部队的去向。伤愈后,爷爷与大部队的联系,无奈之下只得隐瞒姓名,在贵州仁怀赤水河畔的一间制酒小作坊做了一名学徒,历经磨难。

1953年,爷爷带着贵州当地政府开具的介绍信,历尽千辛万苦,终于辗转回到了阔别近20年的兴国老家。当民政部门评定他为“二等乙级革命伤残军人”时,这位铁骨铮铮的军人流下了热泪——为曾经的负伤流血,为终于被承认是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,也为那段浴血奋战的岁月。

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。”这是爷爷生前经常挂在嘴边的话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爷爷总喜欢在晚饭后,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,给我讲述长征路上那些感人肺腑的故事。爷爷告诉我,现在的和平幸福生活来之不易,叮嘱我一定要好好珍惜,努力学习、追求进步,长大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他经常教导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,并要把它作为良好家风永远传承下去。这些话如同一粒粒种子,深深植根于我的心田。

如今,虽然爷爷已经离开我多年,但他的教诲却如同一盏永不熄灭的指路明灯,始终照耀着我的前行之路。

祭拜先烈上塘行

□刘贤慧

日前,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、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李乐天、中共赣粤边特委财政部部长熊其象等烈士在上塘牺牲90年之际,笔者与烈士后人等八人相约,前往信丰县铁石口镇上塘村祭拜烈士。

背脊突围:血染红土的忠诚印记

上塘,南临桃江河与江背村隔江相望,西经朝头坑延伸与崇仙乡接壤,北靠山仔仔大山与小河镇相连。周边崇山峻岭连绵,茂林修竹掩映,上塘仿佛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地。

闻讯赶来的上塘村两任村党支部书记肖水生、严绍华早已在村口迎接我们。一番寒暄后,对上塘村革命历史烂熟于心的肖水生,便将90年前发生在上塘那段悲壮的突围战,娓娓道来:1936年1月初,李乐天、熊其象在上塘村祠堂召开开会时,忽遭粤军第二师第六团一部包围,李乐天、熊其象及警卫员在突围中壮烈牺牲……肖水生讲到战场的惨烈场景时,声音哽咽,眼角闪烁着泪水。

革命先烈的壮举,成为上塘红色的光荣历史。2024年5月,经江西省文物局批准,在人山仔李乐天烈士殉难处立碑纪念。英烈长眠的山脚下,几棵历经百年的梨树,见证了那段峥嵘岁月,此时,梨树已绽放满树的白色花朵,仿佛在寄托无尽的哀思。

寻迹追光:熊其象的烽火人生

说到李乐天,大家耳熟能详,但提起熊其象,便是鲜为人知。熊其象短暂人生有过怎样的经历?

我们满怀崇敬,去烈士牺牲的地方遍访知情人,到烈士的家乡故居探寻点点滴滴,在文史档案中收集资料碎片,从战争亲历者回忆录中寻找只言片语。揭开尘封的历史,沿着烈士的足迹,熊其象短暂人生书写的可歌可泣事迹,渐渐成形。

熊其象,又名熊其相,1910年出生在信丰县西牛镇(当时的星村乡)高丘村熊屋。熊屋位于信丰县城东北方向十里处,屋场南北两条溪流在此交汇,注入贡江上游的桃江。长年水流冲积,在此处形成了肥沃的田野,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熊氏先人,至熊其象的祖辈靠着勤俭持家积累了殷实的家业。少年熊其象出生在殷

实的家庭,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,并在求学期间接受了进步的革命思想,立志投身革命。成年后的熊其象,到家乡临近的山塘茶坑坝做私塾先生,传道授业的同时,宣传革命思想。

1927年春,共产党员肖凤鸣、郭一清等在信丰建立农民协会,掀起了打土豪、分田地,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,熊其象积极投身革命,在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,并于1928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熊其象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,很快赢得了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护。1930年5月26日至28日,信丰县在黄泥排老城屋召开全县第一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,出席代表140多人,经过选举产生县苏维埃政府,熊其象被推选为经济部部长。

1934年1月,信康县县委、县苏维埃政府在牛岭遭敌袭击,熊其象被编入游击队,化名熊芬芝。1934年10月,红军主力长征后,他被编入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领导的游击队,担任特委财政部部长,负责经济工作,保管游击队的经费。熊其象身上系一条腰带,里面藏着金条、银圆,走到哪里都带在身上,革命经费从不离身。1935年12月底,李乐天前往信丰油山潭塘坑向项英、陈毅汇报工作,返回崇仙游击区开展巩固扩大游击区斗争活动。

青山埋骨:二十六载的永恒青春

1936年1月初,在上塘祠堂召开开会议宣传动员时,忽闻群众报告敌军来了。李乐天带领熊其象等6名游击队员,往后人山仔仔撤退,不料敌人已在山腰上堵住了去路。敌人见游击队员突围,便开枪射击,首先是警卫员小黄中弹牺牲。曾经亲历过这场战斗的幸存者叶树林回忆道:“突围中,乐天同志腿部受伤,流血不止,他毅然甩开我们,大声命令:‘你们快走,我来掩护。’他举枪击毙了几个敌兵,用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,英勇就义。”

肖水生动情地介绍:“听前辈回忆,熊其象在突围时冲在前头,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他腰上背的袋子,里面的金条、银圆哗啦啦地从身上滑落,撒了一地。次日,附近的老表看到白军走了,小心翼翼地摸到山腰,割开芦箕,白花花的银圆早被白军洗劫一空。群众就地挖了个坑,将熊其象掩埋。”

青山处处埋忠骨,何须马革裹尸还。熊其象牺牲

时年仅26岁,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熊其象参加革命后,常年在外奔波,生死未卜。家中亲人都不知其音讯,长期为其担惊受怕。几十年过去了,父母盼儿子,弟盼哥,妻盼夫,盼着他安全回来。直至亲人们一个个离世,抱憾终身。寒来暑往,岁月更替,人们对当年战火纷飞的记忆似乎已经模糊。但是,人们对为革命献身的英烈却没有遗忘。20世纪80年代末,信丰县委党史办公室整理史料,发现当年熊其象与李乐天一起壮烈牺牲,民政部门据此逐级申报。

1991年10月22日,民政部批准熊其象为革命烈士并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。其子熊祥烈,在英雄牺牲50多年后,正式确认烈士身份。

民心不忘:口口相传的红色记忆

在上塘村,老一辈的村民回忆起当年的游击队,都会说起“炊具沉塘”“烘衣取暖”“瘸子送饭”“购棺安葬”等故事。“炊具沉塘”说的是:游击队在上塘工作生活,为了不打扰群众和保密,在严氏祖厅自行生火煮饭,转移离开时,将锅、碗等炊具沉入祖厅前面的池塘,打算改日回来时,再从池塘打捞取用。“烘衣取暖”讲的是游击队在寒冷的冬天,下雨天淋湿衣服,来到上塘一名叫肖所角子的游击队员的姐姐家,肖所角子的姐姐取柴生火,帮游击队员烘衣取暖。“瘸子送饭”说的是把背一个叫严赞文的老表,经常帮助游击队做饭。为了不引起怀疑,严赞文安排侄子严庚龙送饭。严庚龙是个孤儿,腿脚不方便,经常借放牛、摘野果之名进山给游击队送饭。“购棺安葬”说的是李乐天牺牲两天后,一名叫王庚生的老表花钱买了一副棺材,将李乐天的遗体收殓,安葬在一个叫寨背坑的坑口……点点滴滴,口口相传,成为红色记忆。

90多年前,上塘因为特殊的环境,成为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坚堡垒。现在,国家将这块先烈血染的土地列为红色名村,给予特殊的政策倾斜与资金扶持。现在,南来北往的高铁从上塘穿境呼啸而过,现代气息扑面而来;桃江枫坑口电站的兴建,高峡出平湖,更是增添了人间仙气。当年李乐天、熊其象和游击队员驻扎的严氏祖厅,如今已建成赣粤边特委上塘游击战争事迹陈列室;在祖厅的左前方,建起了一座雕塑公园;在烈士牺牲的地方,立了李乐天殉难纪念碑。

九十载风雨,梨花开放如雪,依旧守望这片曾被鲜血浸染的山河;新时代长歌,高铁穿梭似箭,载着先烈对国家的美好愿景驶向黎明的远方。桃江水长流不息,忠魂与热土永在,每一寸山河都在寂静中回响着历史的铮铮誓言。